

何其芳与匈牙利汉学家米白

■马靖云

20世纪50年代,中外学术交流已经很频繁了。文学方面的学者,文学所已经接待过苏联的访问学者谢爱诺夫,捷克的汉学家米莲娜,以及匈牙利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米白。

米白是匈牙利科学院研究员,他的研究项目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。1959年12月,根据中匈两国科学文化交流规划来中国访问,为他编写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作准备。在匈牙利他已翻译出版了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《月牙儿》《黑白李》等。12月2日他访问了老舍。接着就要访问何其芳。文学研究所是规划中的接待单位,所内没有外宾接待室,但米白要求家访,何其芳欣然同意。在裱糊胡同36号接待了他。

那天何其芳用四川家乡寄来的茶叶招待米白,应米白的要求参观了自己的藏书。他的书房是名副其实的“书”房,别无它物。室内空间除了进出方便的门和采光方便的窗之外,其余的空间全为书所占据。四壁贴墙放满了书架、书橱、书柜,里面放的书全是双层,为的是节省空间。米白惊叹何其芳藏书的丰富,称他是藏书家。何其

芳谦虚地说:“藏书家不敢当,但作为文学研究工作的需要是可以满足了。”

对这次访问,何其芳是认真充分准备的。他完满地回答了米白提出的关于诗歌的问题后接着说:“你让我朗诵的诗我准备了两首,一首是我的新作《听歌》,一首是李白的《蜀道难》。”“那太好了”,米白听后兴奋地说,同时他从背包内拿出一个小录音机放在桌上,转脸对何其芳说“我先说几句就请你接着朗诵”。这时他手按了一下录音机旁边的一个按钮高声说:“现在请中国著名诗人何其芳朗诵他的诗作《听歌》。”他目光转向何其芳,何其芳点头会意开始朗诵:

我听见了迷人的歌声,
它那样快活,那样年轻,
就像我们年轻的共和国
在歌唱地的不朽的青春;

就象早晨的金色的阳光
因为快乐而颤抖在水波上,
春天突然回到了园子里,
花朵都带着露珠开放。

它时而唱得那样低唱,
象夜晚的喷泉细声飞射,
圆月的月亮从天边升起,
微风在轻轻地摇动树叶;

它时而唱得那样高昂,
象与天相接的巨大的波浪,
把我们从陆地上面带走,
带到辽远的蓝色的海洋;

然后又唱得那样温柔,
象少女的眼睛含着忧愁,
和裂土而出的植物一样,
初次的爱情跃动在心头。

呵,它是这样迷人,
这不是音乐,这是生命!
这该不是梦中听见,
而是青春的血液在奔腾!

这时,米白突然又按一下录音机的开关,笑着说:“我太幸运了。亲耳听到了诗人自己朗诵他的诗作。现在请你继续朗诵李白的《蜀道难》吧。”这时何其芳的面部表情严肃起来,眼睛高视远方、拉着长调子念:

噫吁噫,危乎高哉!蜀道之难,
难于上青天!蚕丛及鱼凫,开国何茫然!
尔来四万八千岁,不与秦塞通人烟。
西当太白有鸟道,可以横绝峨眉巅。
地崩山摧壮士死,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。

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,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。
黄鹄之飞尚不得过,猿猴欲度愁攀援。
青泥何盘盘,

百步九折萦岩峦。扪参历井仰胁息,
以手抚膺坐长叹。问君西游何时还?
畏途巉岩不可攀。但见悲鸟号古木,
雄飞雌从绕林间。又闻子规啼夜月,
愁空山。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,
使人听此凋朱颜!

连峰去天不盈尺,枯松倒挂倚绝壁。
飞瀑泻流争喧豗,砢崖转石万壑雷。
其险也如此,嗔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!
剑阁峥嵘而崔嵬,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。
所守或匪亲,化为狼与豺。

朝避猛虎,夕避长蛇;磨牙吮血,
杀人如麻。锦城虽云乐,不如早还家。
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,侧身西望长咨嗟。

米白全神贯注倾听何其芳时而高昂时而低沉的朗诵。我却一边听一边猜想,他这次朗诵,一定是经过演员登台似的预演过。面部的表情、感情对诗景的融入、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”三次语调的处理都不相同。听这首诗朗诵是欣赏也是一种享受。米白听完双手抱拳作揖又说了些感激的话。临别前再向何其芳深深的鞠了一躬,表示他的感谢。

60年过去了。中国,匈牙利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米白访问中国诗人何其芳,将在中匈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有声的一笔。

从《七八个星天外》说起

■莫砺锋

王一涓的第二本散文集完稿了,向我索序。我对她的好感,便一口应承下来。不久她用电子邮件传来几百页文稿,书名是《闲数落花》。我一向怕读长篇的电子文本,便把目录与后记先读一过,觉得无论是题材还是写法,二书都是名符其实的姐妹篇。既然我还没有通读第二本,这篇序言不妨先从第一本谈起。

两年前初读《七八个星天外》,一看书名便突出声来:到底是辛弃疾专家巩本栋的夫人所写的书,这个书名肯定是本栋的点睛之笔!但是看到《后记》中说:“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人啊,事啊,真是多如繁星。可和你有关的,只能是那几颗星星。……然而,就是那几颗星星啊,却温暖、照亮了你的人生,并与那满天的星斗一起,闪烁在浩瀚无垠的夜空。这本小书里的人与事,就是我生命中的那几颗星星吧。人尽管平凡,事也无关宏旨,但却都是真真切切的,正像夏夜星空点缀在天际的那几颗星。于是我想到了稼轩的那句词:‘七八个星天外。’”原来这是王一涓自己的妙手偶得。这个书名好在哪里呢?先让我们读冯至的十四行诗《我们准备着》的第一节:

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
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。
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
彗星的出现,狂风乍起。

彗星是天空中的怪客,有些彗星光彩夺目,据《新唐书·天文志》记载,大历七年(772)出现的那颗彗星,“其长亘天,竟然横亘整个天空,真是壮观。冯至所说的彗星,当指名震遐迩的大人物。这不,张新颖在《能写师友回忆录的人是有福的》一文中,便引用冯诗并认为彗星是指“非常之人”。然而彗星毕竟是行踪渺然的天外来客,我辈肉凡胎,家中又没有天文望远镜,一生中也难以得一见。还记得1986年初,哄传久违的哈雷彗星要光临地球了,人们奔走相告。2月的一个寒夜,我家附近的一个单位不知从哪弄来一架天文望远镜,架在大楼顶上供大家观测彗星。那夜我排了一小时的队,终于凑近望远镜的镜头,经过主管者的再三指点,才在茫茫夜空中找到了哈雷彗星的情影:模糊的一个小亮点,与旁边的无名星辰没啥两样,也根本没有想象中形若扫帚的彗尾,不禁大失所望。据说哈雷下次回归地球要到2061年,我有生之年肯定不能再睹芳容了。所以与其翘首盼望彗星的出现,倒不如随意观赏平常的满天繁星。对于一般人来说,只有北极星、北斗星和牵牛星、织女星等少数几颗星辰能叫出名宇,其它的星斗都是无名之辈。古人以为像传说那样的杰出人物才会变成星辰,民间却传说天上的每个凡人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,史铁生的《奶奶的星星》便持此说,《七八个星天外》的书名也出于同样的想法。

《七八个星天外》共分七辑,只有最后一辑《红楼絮语》的五篇都是谈论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,像是学术随笔,其余六辑的内容全是记人,正像作者所说,“人尽管平凡,事也无关宏旨,但却都是真真切切的。”有几辑写得格外生动,例如第三辑《自行车驮着的岁月》,所收16篇短文的惟一记叙对象就是她的宝贝儿子。这个孩子的小名就叫“贝贝”,如今已是风度翩翩的青年绅士,但书中所写的都是他高考之前的少儿时代。这是母亲眼中一个男孩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的全过程,如有刚当上母亲的女性读者,大可当作《育儿经》来读。至于我自己,最欣赏的是第四辑《我在哪里找到了你》。此辑收文十篇,其中有四篇写的是我熟悉的人物,读来倍感亲切。《书果》写其丈夫巩本栋,“书果”当然是谑而不虐的昵称。本栋是

我的同门师弟,同事20多年了,堪称老熟人。王一涓说本栋“是个慢性子”,我深有同感。凡有同事一起出差,大家约好在车站或机场集合,最后一个到站的肯定是本栋。不过他并不误事,有时离进站或登机只有一两分钟了,大家焦急万分,望眼欲穿,本栋不慌不忙地准时现身了。但是王一涓还是让我知道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本栋逸事,比如他读中学时随身携带一把弹弓,读博时写信指示家中购买“黄河牌”彩电等事,十分有趣。《写在腊梅花开时》写的是师母陶芸先生,她是程千帆先生的夫人。那时我与程先生住在同一座楼里,先生住东头一楼的101室,我住西头六楼的606室,正好构成一条对角线。从我家的阳台探出身去,便可眺望到那个栽着腊梅花的小院子。阅读王一涓怀念陶先生的文字,令人百感交集。《何日彩云归》追念同事王彩云。王一涓与王彩云分别负责中文系研究生的管理和教务,工作关系紧密,我曾在电子信箱的收信人栏中把她俩合称“中文二王”。王彩云因患恶疾英年早逝,我有事未能参加追悼会,便代系里拟了一份挽联:“彩云易散斯人斯疾,霁月长明此面此心。”阅读此书,眼前浮现出王彩云淳朴憨厚的笑容。《“非典”教授》写中文系前任主任许志英先生。我在南大任教的前十年间,许先生先后担任副系主任和系主任,是我的顶头上司。我对领导一向敬而远之,除了工作关系,与许先生并无交往。有一阵虽然同住一个小小区,路上相逢也只是互相点头而已。我只知道许先生有见识、有性格,后来因他请我为他所拟的两份挽联调整平仄从而得知他不耻下问,此外所知无多。王一涓把许先生作为“非典型性教授”的一面展露无遗,生动叙述了许先生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节,尤其是他退休以后直到生意索然、毅然弃世的晚年光景。读过此书,许先生的完整形象才在我心中清晰起来。《七八个星天外》所写的便是这样的凡人凡事,但无论对于作者,还是读者,他们都是“夏夜星空点缀在天际的那几颗星”,他们不像彗星那样令人震撼、敬畏,而是使人感到亲切、可爱。我相信,这样的书要读名人传记更贴近我们普通读者。我也相信,凡是喜欢《七八个星天外》的读者,一定会同样喜欢《闲数落花》,因为影:模糊的一个小亮点,而论文笔的洗炼,则后者更上一层楼。

说到这里,读者也许会问:王一涓是谁?就像书中所写人物一样,她也是一个平凡的人。她是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77级大学生,毕业后教过十年中学,后来南大中文系从事研究生管理工作,直至退休。王一涓有两个全系公认的特长,一是普通话说得标准,所以退休后还被返聘负责南大普通话测试站的工作。二是散文写得出色,文字清新流畅,且擅长将平凡的题材点铁成金。当年许志英先生写作随笔,便特邀王一涓帮他润色修改。许先生的随笔集集以后,曾在后记中指出:“我还要特别感谢王一涓女士。我请她为我的随笔把文字关。因为她有十年教中学语文的经验,善于‘咬文嚼字’,又写过不少优美的随笔,所以请她帮忙做这件事。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很对头的。她连我以前写的几篇随笔,也全看了。她的修改很慎重,尽管一般不是很多,却都是改之所当改,往往有画龙点睛之妙。”许先生是专治现当代文学的教授、博导,他的话当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。《闲数落花》第一辑中的《从前篇》《文苑人》《文苑旧事》等篇,去年曾公布在南大《小百合》的系版上,全系师生莫不先睹为快,好评如潮。所以我认为,王一涓是一个没有加入作家协会的优秀散文作家。古今中外,有许多优秀散文出于业余作家之手,《七八个星天外》与《闲数落花》也是如此,值得一读。

关于笔名、化名那些事儿

——缅怀周绍良先生

■冀勤

写文章、出版著作,不用自己的本名,而用别名(笔名、化名),是我国历史上早有之事,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理由,不同人也有不同人的理由,总之都是出于各种不同的需要,才产生了这一文化现象。

这里我要说的是“一粟”这个笔名,它作为编者,最早见于1958年上海古籍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红楼梦梦书录》。这本资料书好像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也印过,记不清了。1963年12月才由中华书局纳入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》,作为《红楼梦梦卷》(全二册)出版,本世纪又重印过。

“一粟”显然不是编者的本名,他是谁呢?1963年我入中华书局以后,曾在社办公室随便问过什么人,有人说是周绍良和朱南铣的化名,有人说是周绍良,还有说是朱南铣。徐调孚同志说这是上海出过的书,我们拿来再版的,编者究竟是啥情况无须去了解,所以不清楚是啥人。调孚同志说的符合当时情况。改革开放以前,在我国出版著作或发表文章,作者情况事先一定要通过组织了解清楚。如果著作或文章达到出版或发表水平。而作者政治情况不佳,一般可用别名(笔名、化

名)出版或发表。比如:王仲闻(王国维之子)在民国时期曾做过书报检察官之类的事,建国后没有正式工作,在中华书局当临时工,以发挥他的专长,他的《李清照(漱玉词)校注》即化名王学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又如如:陈宗棠1975年秋,投来《水滸日闻抄》,粗翻一下觉得基本可用,即由办公室致函他所在的单位,了解情况,回函称陈宗棠在学生时代参加过安那其学社,有无政府主义之嫌,未作结论。当时领导金沙同志犹豫,可不可以给他出书,我觉得他只读过六年小学,所谓学生时代,年纪必小,不可能有政治问题,便建议以他的笔名马蹄疾出版。再比如,《杜甫卷》是集体项目,编者有中华文学编辑室的,也有局外的孔凡礼、李淡虹参加,即化名华文轩出版。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。下面再说“一粟”的事儿。

1975年春节前,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撤销,我与周绍良等若干同志最后一批回京,大约这年年初的某天,下午下班回家,路过历史编辑室,正碰上张忱石送绍良同志出来,他说要去东单,便与我同行去灯市口西口乘电车,一路走一路聊。我忽然想起问他“一粟”是不是他的笔名,他说“不是,是朱南铣的”。我说“有人说不是的,也有人说是你们俩的化名”,他毫不犹豫地说:“那是误传。他是人

民(出版社的)。”我心中陡然升起对绍良同志的无限敬意,竟呆住了。他奇怪地问我怎么啦?怎么突然问起这事?我说近来有《水浒传》资料的稿子来,想到了《红楼》资料。他说:朱南铣搞这书时我知道,他搞完请我看过,我只是提了点意见。停了停,他又问我:“你知道他是谁吗?”我说不知道。他说:“此人挺有学问的,就是有点儿怪。……他死了,你听说过吗?”我说:“他死的那天,我正被他们十三连(人民出版社)拉去挨批判。第二天早饭时听军宣队说,他是晚饭后喝了点酒,去挑水失足掉下塘的,不是自杀。我相信这个说法,因为我看到那扁担和鞋脱落的样子是滑下去的状态。”为此,我们又感慨了一番,都为朱南铣感到非常惋惜,同时,我也很敬佩周绍良先生的高尚品德。

前些年,我读到汪曾祺先生的《一粟古人》,其中有一篇《未尽才——故人偶记》,里面写到朱南铣。这里不妨转述一下,供读者了解:

汪先生也说朱南铣“是个怪人”,说他“个子不高,长得很清秀,一脸聪明相,一看就是江南人”。说他“外文、古文都很好,很渊博”,“别人称为‘无锡学派’,无锡学派即钱锺书学派”,其特点是“学贯中西,博闻强记”,说“他是念哲学的”,在西南联大都“花了很长时间钻研东西地理”。说他“家在上海开钱

青年袁少冲的学术理想

■肖风

五年前,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袁少冲放弃留京在高校任教的机会,回到妻子的老家运城。他当时的选择曾令很多人不解。

身边的多数同学,读博的唯一目的就是留京。何况就有一所不错的高校向他抛出橄榄枝。尽管当时北京房子均价已经两万五,可是,多数年轻人不都是贷款买房吗?袁少冲的打算,是贷款至少20年才能还清。耗费这么长时间的精力和财力解决安家落户的问题成为“北京人”,有些不值。他需要把有限的时间尽快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。

更重要的原因,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一个需要照顾的家庭:年近花甲的农民父母,尤其父亲车祸后身体大不如前;岳父岳母前些年都做过大手术——面对这些现实,他觉得非但不能向父母索取,而且到了付出回报的时候了。

本科毕业后,袁少冲和妻子都曾分别工作过,靠工资和学校的奖学金、课外代课收入来维持日常生活,日子本来可以按部就班地过下去。但是,他跨专业转向了文学,考取了公费硕士、博士。

“为什么学习文学?其实只是为寻找一些答案,回答我在思考人生时候的困惑。比如钱为什么这么重要,

每个人为什么都在想它,追逐它?社会中的种种不公,不靠什么方式能够改变?为什么当今世界的物质生产爆炸,而精神生产如此凋敝?诸如此类,显然工科知识是解决不了的,所以我只能到人文学科中寻找,有一点要从精神生产的大小愿望。”袁少冲的目光坚定,青年学者曾经的迷茫、自信和对未来的希望,在他简短的描述里清晰可见。

这是袁少冲第二次放弃留京的机会。他本科学的是工科,毕业就有去首钢的机会,还解决北京户口,但袁少冲为了跨专业考研放弃了。这一次,为了生活也为了自己的追求,他再次放弃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留京机会。

返回谁的老家是个问题。妻子老家在运城,袁少冲老家在洛阳。双方父母都不希望子女离得太远。考虑到孩子需要岳父岳母的帮衬,更鉴于找工作时运城学院更有诚意,袁少冲决定选择运城学院。好在洛阳和运城两地只有三小时车程,袁少冲能时常回家看望父母。

然而,想象和事实永远会有差距。运城学院的工作不像袁少冲想的那么宽松,甚至比较忙碌。“我接受这些差距。我向母亲学会了一个法宝,那就是乐观,忙碌、挫折也是锤炼自己的机会,也能学很多人生的道理,也能从细微处洞察这个世界。”道之一想,袁少冲就觉得,忙碌中也有

很多收获。

既然当了老师,就要站好讲台。袁少冲首先要求自己成为好老师。每年的评教他都名列前茅,在学校的青年教师赛讲中,他得过一等奖,还代表运城学院到山西省赛讲获得三等奖。比这些成绩更让袁少冲欣慰的是,但凡自己带过的学生,大都能得袁老师讲得还不错,许多学生即使离校也对袁老师念念不忘。

一个地方高校的青年教师面临多少压力,我们无法想象。袁少冲在教学之外还担任兼职辅导员。辅导员琐事繁多,袁少冲的班有70多人,占用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,去理睬彼此不和的班干部,不断地向学生叮嘱宿舍安全、交通安全、网络安全等问题,去督促学生的学习,鼓励他们考研、考公务员,还有每年例行的各种评优奖优等等。另外,系里的很多公共活动他也常常参与,这些任务派到袁少冲头上,他基本上从不借故推辞。比如山西省人文知识竞赛、齐越节朗诵大赛、山西省青年教师赛讲,以及学校的读书征文活动评委、演讲比赛评委、朗诵赛评委、教工朗诵赛主持人等等,每年各个季节都有各种活动需要参与。

更重要的,作为主要成果的科研不能丢。袁少冲平均每年都有CSSCI论文发表,也主持了山西省的科研项目,出版过专著,参编了两部教材,顺利通过了副教授职称。忙里偷闲,

他还系统地读了两遍《鲁迅全集》,明确了自己在鲁迅研究方面的具体计划。他反复思考的是,我们的民族还处于“无道”的时代,失去了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之“道”,却尚未成功建立一个现代之“道”。他最大的愿望是期待这个现代之“道”早日铸成,并希望能参与一点相关的工作。

袁少冲说,来运城之后,最大的收获就是丰富了人生的体验,酸甜苦辣、沉浮乖舛都是体验,都是丰富对世界观察的方式。“在运城,我有更多机会接近基层,尤其是农村、农民,这些体验相当宝贵。有基层的人民作参照,我可以时时提醒自己。比如,今天运城38度,确实比较热,可是转念一想:我岳父60多岁还要顶着骄阳下地干活,比起基层的劳动人民我的工作条件已经好多了,就别那么娇气了。”他说,知识者是容易娇气的,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学术上,这挺危险的。对基层的体察渗透在自己对鲁迅的研究中,如果没有这些经验,袁少冲都能想象到,自己做的学问可能会学院化、抽象化得多。

但是在运城这样的城市,学术交流的视野和平台便受到局限。袁少冲坦率地说,他当然想过这个问题。“但是比较而言,我还是更看重这里的安静,能够让我沉潜下来好好做学问。如果能穿越,我还是选择到运城,这个决定对我而言,是对的。”